

观点

[Perspective]

没有演绎,故事总显得蹩脚*

管 兵**

【摘 要】当前社会科学方法教学存在显著的“理论-经验”二元割裂:教材体系聚焦经验材料采集与归纳技术训练,演绎方法所代表的理论建构能力培养被忽略,或者被完全等同于经典文本解读、学科史课程。这种割裂导致研究者在处理“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时力有不逮,尤其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颠覆传统归纳优势的当下,演绎能力更应成为研究者的核心能力。现实研究中,演绎不足具体表现为:有理论视角无理论演绎、有文献综述却另起炉灶、有经验素材但缺少分析、有经验总结未推论外延。破解之道在于构建“演绎操作化”路径:对范式原初问题的持续追问、对话核心文献的演绎路径、向前演绎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系统化的研究设计、维度化分析经验材料、明确情境化约束条件。社会科学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方法自觉,而今面对 AI 革命更需重拾学科初心,既深耕经验厚土,又锻造理论硬核。社会科学学者只有提供独特的、相对于人工智能仍保持优势的知识贡献,才能保卫自身的职业和志业。

【关键词】归纳;演绎;理论框架;方法论;人工智能

一、导论

理论常青。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理论创新,进而积累人类关于经验世界的理解(Merton, 1968)。以假设或者原理为原点,向前演绎,理论开枝散叶,渐次形成体系。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模式实现知识增长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科斯(Coase, 1937)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提出的原初问题和假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JZD029)的资助。

** 管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教授,guanbing@scut.edu.cn。

引文格式:管兵. 2026. 没有演绎,故事总显得蹩脚[J]. 公共管理评论,8(2):241-260.

Cite this article: Guan B. 2026. Without deduction, the story always seems awkward[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 241-260. (in Chinese)

设性解释,为后来交易成本理论、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多个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最初的演绎原点(威廉姆森,2023)。有效的知识积累是学科成长的真正动力,这高度依赖于抽象演绎而生的理论之树。

归纳带来经验总结。经验总结是知识发现,对理解现实具有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其必然能成为理论。经验总结需要抽象化,而抽象过程必然是演绎的。唯有向上对接抽象演绎,才能确定知识发现的创新性,进而实现与现有理论的衔接和发展。经验研究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两者有机融合、相互赋权,才能赋予研究理论质感和经验质感。“从案例研究中构建理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反复的过程。虽然研究人员可能一次只关注过程的一部分,但过程本身涉及步骤之间的不断反复。例如,研究人员可能从跨案例比较转向重新定义研究问题,然后到现场收集其他案例的证据。此外,这个过程充满了对理解数据的新方法的分歧和对单一理论框架的收敛之间的紧张关系。”(Eisenhardt, 1989)

当学术研究对理论有高需求时,演绎便成为关键方法。这具体表现在广受学界关注的顶级期刊对稿件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当今中国对本土化知识体系的宏大需求上。方法论专家长期以来对科学范式、归纳、演绎、证伪等进行了深入探讨(Lakatos, 1970;张杨,2007;彭玉生,2011)。学者对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讨论也非常丰富(蒙克和李朔严,2019;谢宇,2024)。我们无需在哲学和基本方法论角度上再作赘述。如何在一篇具体论文中,开展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边燕杰,2015),或者更进一步实现导向理论的经验研究?要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发挥演绎的作用至关重要,演绎赋予经验以理论化的价值。归根结底,演绎和归纳是一种相互强化、彼此赋权的关系。

现有方法教材多侧重于教授如何采集经验材料和进行归纳,却弱于介绍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端,即理论化的过程。现行做法通常把理论留给社会科学经典名著选读或者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等课程,让理论训练成为学科史的学习或者哲学阐释。而在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中,如何处理理论问题,往往在方法与理论的隔离式教学中缺失,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一环。在经验易得、大数据喷涌的时代,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归纳能力,对演绎理论的追求更显人工生物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研究者演绎能力不足、意识薄弱,必然会导致研究理论成色不足。在学术实践中演绎不足有多种表现:有理论视角无理论演绎、有文献综述却另起炉灶、有经验素材但缺少分析、有经验总结未推论外延等。对范式原初问题的持续追问、对话核心文献的演绎路径、向前演绎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系统化的研究设计、维度化分析经验材料、明确情境化约束条件,这些路径有助于学者开展可操作化的演绎工作,实现有意义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

二、经验与演绎:经验不是理论的脚步注,而是理论本身

社会科学方法论至少从三个方面讨论经验。第一,如何在经验层面上测量概

念,这是操作化环节,虽涉及理论,但更重要的是经验测量;第二,如何采集具有代表性、充分性的经验资料,无论是定量数据还是定性文字;第三,如何运用经验,无论是借助定量模型还是定性的叙事方法和案例比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用符合方法论规范的方式通过经验验证假设。方法教学和学习关注的议题是经验层面的具体操作办法。关于方法的讨论往往止步于此,甚少涉及如何处理经验的理论意义、经验如何上升为理论等问题。这一点在定量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以至于从事非定量研究的学者总是从理论缺失的角度批判定量方法,认为定量学者利用繁复的模型和数据最终仅提供了接近常识的经验总结。实际上,在这个角度上,定性研究也并未展现出明显优势。大量定性研究满足于对经验的详尽描述和依据独特案例的经验总结。理论探讨止步于经验术语或依附于宏大理论的经验阐释。不同研究方法对待经验和理论的方式基本是相似的。

社会科学研究讲述的不仅是经验层面的故事,更是理论层面的故事。“如果理论只是简单归纳,那么因果就正如休谟所言,是经验关联的代名词。”(彭玉生,2011)但如何进行理论思维,并不能简单归为“思维的跳跃”(彭玉生,2011)。理论思维的本质是演绎能力。在理论框架的演绎之下,理论与经验融合,演绎与归纳衔接。理论是联结经验的理论,经验是融入理论的经验。本文旨在论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本身就是理论,尤其是论文中呈现的经验。在这一视角下,对经验与理论的探讨并非经验主义和泛理论主义,并非主张万物有理。恰恰相反,经验和理论都是高度选择性的。论文呈现的是导向理论的经验事实,每一处经验细节都具有理论意涵。在经验和理论融合的视角下,演绎的视角在方法论上变得更加重要。在演绎的视角下处理经验,便是将经验理论化。在此视角下,经验并非理论的脚步注,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融合的。适度抽象的理论向下联结经验,而经验呈现的每一部分内容都具有理论意涵,并向上衔接理论的抽象维度。经验是为回答理论问题、依据社会科学方法论规范收集的选择性素材,在一篇论文中使用的经验均对应假设的理论维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经验就是理论本身。这一视角下的经验更强调以下特征。

经验是维度化的。经验需要在理论维度下呈现。这里的理论是在演绎之下提出的衔接经验的具体理论框架。理论框架中的概念、变量和关系构成了联结理论和经验的具体维度。这些维度是切割经验的手术刀,鲜活的经验素材只有在切割的维度上才具有呈现理论的价值。维度化的经验并非碎片化的。经验研究学者热爱田野,鲜活实践打动人心。学者(并非仅限定性研究学者)容易倾向于讲述一个整体主义的、包含全部细节的故事。但维度化叙事与此并不冲突。维度化叙事同样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一个特定约束条件下完整的理论故事,可能并非完整的经验故事。因为维度化的经验呈现是经简化且逻辑清晰的,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也契合论文简洁规范的要求。

经验是高度选择性的。论文本身受限于既定篇幅,须对经验素材进行取舍。经验选择依赖理论框架:只有在理论框架的具体维度下的经验才是论文所需的经验,

其他素材要么作为极简背景被使用,要么成为冗余素材。论文中使用的所有经验材料都应相关且有效。如何判断相关性和有效性,其依据是理论框架和支持理论框架所必需的经验材料。无论经验材料多么鲜活有趣,也无论调查者多么期待与他人分享,只要它们与理论无关,就必须舍弃,或者在下一篇论文或作者手记中另行呈现。

经验是理论饱和的。所呈现的经验应能够充分支持理论框架,这至少包含以下层面:新概念在不同维度上的具体经验内涵、变量的不同观测值的具体表现、变量关系在经验层面发生关联的具体机制,以及充分考虑控制变量与竞争性解释的经验表现。在对这些经验进行介绍的过程中,理论分析蕴含其中。同时,每一部分经验介绍都服务并融入理论框架。这虽对经验提出了苛刻要求,却能显著提升资料收集和使用效率。实际上,融入理论的经验是边界清晰、内涵明确的有限经验,这恰恰有助于实现理论饱和。

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时常困惑于这样的现象:不少博士生在田野中认真观察、访谈,甚至驻场调研或者直接参与实习,长达数月、数年,获得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但论文依然难产;而有些学者在旅途奔波中仅走访寥寥几次,便能产出具备发表质量的论文。两者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是否能够在调查前、调查中、调查后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当然,既定理论框架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方案:带着既定理论框架进入田野,也会抑制研究者感知经验世界的敏锐性,降低得到有趣发现的机会,反而导致研究僵化无趣。但若能在经验调查之前就初步建立理论演绎框架,则非常有助于高效采集经验素材,为理论所用。

融合经验与理论的中心环节是通过演绎而生的创新性理论框架。缺少演绎,理论框架无从谈起,理论化不足,经验也不具有理论意义。演绎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逻辑之一。它不单单是抽象的哲学方法论理念,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方法。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可借助数学模型演绎理论,这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辨和阐释具有显著差别。即使并非以纯粹理论演绎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学者,也可以在文字表述中提升演绎水平。例如,周黎安(2007)被广为引用的关于官员晋升的文章,既无数学模型,也无经验数据统计,完全依托文字表述,演绎出了严谨规范的理论框架。

在导向理论的经验研究中,理论既非脱离经验、无法验证、无从归纳的,也不是完全依赖经验的简单总结和阐释。中层理论为经验研究提供了更为务实的导向。中层理论与难以验证的宏大理论不同,也超越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它一方面强调经验可验证,另一方面又超越经验,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普遍性(Merton, 1968)。

三、经验研究缺乏演绎的具体表现

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往往都会有不同类型、范围、深浅的经验材料,但理论并不见得随之产生。缺乏演绎往往直接导致理论创新不足,也会带来经验介绍逻辑不

足,掉入描述主义陷阱,导致学科话语权的结构性弱化。缺乏演绎建构的理论体系,会使社会科学沦为经验和数据的附庸。现象描述难以替代对发生机制的理论解释。Lakatos(1970)论证,缺乏理论硬核(hard core)保护的的经验研究,难以应对反常事实的挑战。演绎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研究者基于普遍理论预设,推导出具体、可验证的假设或结论(Auriacombe and Holtzhausen, 2014)。公共管理研究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人类行为、组织结构和政策结果的复杂系统,演绎通过提供逻辑框架,使这些现象更易于分析,并让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规范的经验研究具有理论可行性。大致而言,演绎在经验研究中具有以下主要功能。首先,有助于从理论上保障经验研究的可行性。社会科学问题涉及多变量和多主体互动。演绎通过在特定理论前提下推论可检验的假设,简化复杂事实,让研究可行且聚焦(King et al., 1994)。第二,有助于开展科学验证。演绎通过推论出创新性假设,允许研究者通过数据证伪或支持假设,让经验研究更加规范。第三,有助于推动理论发展。在既定的理论前提下,演绎结果可直接用于完善或扩展理论,让理论知识得以积累、增长。演绎贯穿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流程,形成一个从理论到实证、再回归理论的闭环。从理论构建开始,学者先从文献中界定所要对话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再从这一问题和理论出发,向前进行创新性推论,提出假设,从理论推导出具体、可检验的假设和解释框架,并据此进行研究设计,包括方法选择、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然后进行资料分析,验证假设,进而对话和发展理论。这一流程体现了演绎的“自上而下”逻辑,有助于提升研究过程的系统性和学理性。现实研究中,缺乏演绎的问题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缺少演绎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部分经验研究更强调情境理解而非假设检验,研究定位聚焦对特殊经验的理解和总结。尤其是在面临特别复杂的情境时,这类研究受制于问题的复杂性,难以对话既定理论推论出清晰假设,因此难以与现实经验有机融合。其二,在一些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经验领域,成熟理论的缺失限制了演绎的应用,在这些领域,描述和归纳更加重要。其三,缺乏演绎还与特定的学科传统相关,有些学科传统上更倾向于归纳和描述性研究。

在能够并应该运用演绎方法的现实研究中,出现缺乏演绎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认真处理理论和经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以理论视角代替理论演绎,有文献综述却另起炉灶;要么没有依据理论分析维度来描述经验,仅满足于丰富内涵的经验总结(见表1)。这既无助于理论发展,也导致经验呈现缺乏逻辑、面面俱到,成为既定理论的经验脚注。

有理论视角无理论演绎:直接应用已有理论。正如前文在理论框架部分所言,有论文会直接将特定理论作为经验研究的视角使用,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理论演绎。这一做法比较常见,既有上文所说的将特定的理论模式直接应用到具体案例上,也有直接使用更为宏大、更为基础性的概念和理论。例如,应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分析政策演变,使用路径依赖的视角分析治理历史,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直接分析基层治理,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结论对照部门案例等。这一做法固然有助于理解经验现实,类似于用理想类型的光芒照进现实,进而理解并检验经验与理想类型的异同。但这并不能实现理论创新,仅证明这些理论的视角和已有理论模型在特定案例中也具有解释力。更具体的例子可参见农村和乡土中国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有大量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来分析具体经验的论文。从中可见这一学术概念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其影响力持续至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真正的本土化标识性概念。然而,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论述,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乡土中国的理解,是在 1947 年正式完成的(费孝通,1948)。70 多年过去,相较于 1947 年之前的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及技术革命已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深刻变迁。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本应有所发展并得到更好的演绎,进而开枝散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表 1 经验研究缺乏演绎的具体类型

		归纳	
		充分	有限
演绎	有	经验就是理论	经验作为例证
	虚假	有理论视角无理论演绎 有文献综述却另起炉灶	
	无	有经验素材但缺少分析 有经验总结未推论外延	

有文献综述却另起炉灶:给经验一个“全新”解释。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作者力图给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在解释力度上超越已有范式或者引入更具新意的要素。另一种可能是作者没有认真对待已有文献,未能有逻辑地梳理这一议题下从原初问题到最新文献的演绎关系,未能在真诚对话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理论贡献。第一种类型是在老议题下作出显著理论贡献的路径,往往并不常见。这需要作者对原初问题进行全新的假设和演绎,重构理论框架,并论证新的理论框架确实超越了已有解释。第二种类型更为常见,即作者并未回到范式的原初问题,没有从基本假设出发进行演绎,往往构建出来的所谓“新理论框架”并不能成为原初问题的新范式。新的理论框架仍以既有假设为潜在基础,其构成框架的具体维度并不具备新的突破,只是对已有文献中的框架的简单增减、调整。这一做法存在过度包装的嫌疑,也无从定位其在理论脉络中的贡献。由于这类研究也包含对现有文献的介绍和讨论,论文看起来是一篇文献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因而具有迷惑性。

有经验素材但缺少分析:未经加工的原材料。社会科学学者特别重视鲜活的田野实践经验。不少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就是对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读者通过案例经验记住了这些经典研究。这些高度重视经验的经典研究往往在经验层面就具有新

意,呈现的是全新的经验。成为经典的另一个必备条件是经验本身蕴含的理论性。二者对于经典研究缺一不可。即使是像《叫魂》这样依赖档案经验的历史研究著作,其从不同经验维度对著作核心逻辑的呈现也是使用和组织材料的基本原则(孔飞力,2012)。材料本身具有可分析属性。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依赖于贴切运用研究的理论框架。寓理论框架于经验细节中,分析性才能得以具体落实。生动的文笔和经验本身的故事性固然可以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但学者仍需从中挖掘理论关联性和学理逻辑性。缺乏演绎视角下的分析,会导致经验材料使用低效冗余、逻辑杂乱无章,甚至引发各种理论误解。材料的使用最能考验定性研究学者的功力。如何让经验材料更有效率、更有力量,学者需要在内涵与外延、演绎与归纳、描述与分析之间平衡取舍,删繁就简、去伪存真。

有经验总结未推论外延:满足于丰富内涵。无论定性还是定量研究,叙事和数据都蕴含现实世界的丰富内涵。世界缤纷多彩,万事万物相互关联。定量研究由于其样本量足够大,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结论的普遍性意义容易理解。对于定性案例研究而言,过于注重对丰富内涵的描述,则会导致社会科学研究与纪实文学、媒体深度报道等趋同,甚至在经验内涵的深入广泛程度上远不如后者。丰富内涵的经验总结具有意义,但其意义不一定指向理论创新。对经验内涵丰富性的追求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坚持地方性知识本身的理论意义。这一视角认为,如果对整体经验没有民族志般的认知,就无从把握细节背后的意义,理论理解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整体性理解,对话和比较只会是蹩脚的。在整体主义视角下,学者强调对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解,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单纯讲故事(Bevir, 2011)。在缺乏研究的经验领域和地域开展这一视角下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在这些本身具有独特性、差异性的案例上,经验总结本身就具有创新意义。而在社会科学充分渗透甚至高度内卷的领域,对话和比较成为必需,由理论维度形成的普遍性意义成为衡量经验总结的关键指标。

在缺乏演绎的情况下,经验呈现会有缺乏逻辑、无所不包、被处理成“举个例子”等特点。大量看似同一个议题之下的经验素材被置于同一篇论文中,反而显得支离破碎。事无巨细的经验介绍虽追求经验的整体性,但对读者而言,却十分容易失去对研究的整体性理解。简化经验叙事有时候并不容易,这是重要的学术写作训练内容。把一个故事讲得复杂依赖于充分的资料,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则依赖于理论框架。对于初学者而言,前者更为容易。作为“举个例子”的经验在具体研究中十分常见。在作者已经形成特定的判断之后,再用经验材料具体展示这些判断,此时经验的作用不是论证,仅仅是展示判断的例子。如果论文本身是一篇理论文章,以演绎推导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判断,经验在论文中的作用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经验只是理论脚注。如果论文是一篇经验研究论文,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让论文失去了意义,因为这里的经验和理论完全是脱节的。这会进一步加剧学术研究与日常实践“两张皮”的问题(梅赐琪,2025)。由于这些表现,故事最终显得蹩脚;看似内涵丰

富却并无逻辑,看似处处相关却逻辑割裂,看似有理论支撑却与经验无关。这弱化了经验的价值,在方法论上沦为朴素的经验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不仅仅因为缺少演绎而导致经验使用无的放矢,还会导致难以开展有效归纳,更不利于得出经验总结。

四、演绎：落实在研究过程的每一环节

演绎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早在现代社会科学正规化之前就已存在。现代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力图将理论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让理论拥有坚实的实证基础,进而添砖加瓦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数学演绎,还是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文字表述,新范式和中层理论的形成都依赖严谨的演绎。正如学者讨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研究所总结的那样,治理理论虽然表现出“解难题”的能力,但这一能力以学科“形而上学”走向实用主义为代价。治理理论的基本假定、方法论和学科理性依旧是“七巧板”式的碎片化存在。虽然治理理论总结了公共管理领域大量新事实,但并未构成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王诗宗,2010)。其核心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以贯之的理论演绎体系。演绎可以完全不依赖经验,通过形式模型进行纯理论研究,比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博弈论,或者像韦伯所采用的理想类型方法进行演绎(韦伯,1999);也可以是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训练中,需要更加重视演绎方法,并形成可操作化的具体策略,从而与归纳方法有效结合,产出具有理论含量的经验研究作品。破解之道在于构建“演绎操作化”路径:对范式原初问题的持续追问、对话核心文献的演绎路径、向前演绎提出创新性理论框架、系统化的研究设计、维度化分析经验材料、明确情境化约束条件。具体而言,演绎在研究过程每一环节的作用和常见误区如表 2 所示。

表 2 演绎在研究过程每一环节的作用和常见误区

研究过程	演绎核心特征	作用	常见误区
研究问题	范式化原初问题	确定演绎原点	仅有经验问题
文献回顾	精准化核心文献	确定演绎路径	面面俱到、冗长
理论框架	创新化理论框架	确定演绎创新	事件流程图、技术路线图、思维导图
研究设计	系统化研究设计	划定稳健性解释所需的充分经验范围	仅介绍如何采集资料
经验部分	维度化描述和分析经验	高度选择经验	讲述一个整体主义或支离破碎的故事
总结讨论	情境化约束条件	界定控制变量和竞争性解释	忽略,转而讨论下一步研究的议题

(一) 范式化原初问题

开创新范式的研究总有一个原初问题和相应的基本假设。从物理学的日心说和地心说问题出发,物理学家围绕一个又一个假设进行验证,构建了现代物理学大厦。交易成本经济学从“为什么要有企业”这一问题出发,逐步演化成为厚实深刻的理论体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些基本问题之下建立学科新范式,并不断拓展、迭代。

在特定的理论范式下推进边际创新研究需不断回到范式原初问题和基本假设,定位一项具体研究在原初问题和基本假设下的演绎位置,进而构建理论范式之下的中层理论。沿着理论范式原初问题不断向前追问,在回顾已有文献对原初问题不同角度的回答之后,既可以更具体地定位具体研究的具体问题,又可以向原初问题追溯具体研究的真实理论意义及与现有文献的关联。

原初问题定义了一项具体研究所处的理论视角和需要处理的文献理论脉络。很多优秀学者长期在一个原初问题之下添砖加瓦,积累成果。这非常明智,也非常高效。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刺猬型”学者——盯住一个问题不放,长期深耕,最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学者。学者需要确定个人研究的原初问题。选题是学者学术生涯的起点。伟大的学者会开创新的选题,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兴起”的问题。范式追随者需明确自己研究所属范式的原初问题,为其增加新的理论养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产生巨大的理论贡献,进而塑造知名学者。学者需要从事重大选题的研究,所谓重大选题就是原初问题足够重要——无论是在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意义上,还是在纯粹学术理论意义上。长期而言,学术理论意义是衡量选题是否重大的最终尺度。

(二) 精准化核心文献

最直接相关的文献是一项具体研究的出发点,研究问题是该文献的直接延续,研究空白源于此。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的目的在于讲述一个演绎故事,导向真实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创新性辩护。论文对话的最核心文献位于已有文献的终点,它是最新、最前沿也最重要的文献。在学术作品中使用文献需精准选择。学者看文献,更多是为了超越,所以应阅读和对话文献里最新、最领先的成果(李连江,2016)。在具体研究的维度上,最核心文献把特定理论范式的原初问题演绎到了最近、最重要的位置。作出这一核心贡献的可以是一篇文章、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位作者的核心观点。最核心文献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一项研究的潜在重要程度。一项具体研究就是在最核心文献的理论基础上向前再走一步(仅仅一步)。新的研究既是已有理论的有机延续,又是对现有文献的审慎跨越,这具体体现在与最核心文献的关联上。这也是经验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从范式原初问题到最核心文献的梳理是呈现已有演绎关系,从最核心文献到本

研究的问题与假设是开展创新性演绎。由此形成从原初问题到本研究问题的完整演绎逻辑链条,进而定位本研究对于原初问题的意义和创新性。这一链条中的文献即核心文献。通过依赖原初问题和核心文献进行高效演绎,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学术意义和创新性就不言自明。

与一项具体研究相关的核心文献有如下三个特征:与范式原初问题的相关性、与本项研究的相关性、在演绎脉络中的重要性。以政策扩散研究为例,可非常清晰地定位一项经验研究所需对话的文献。政策创新扩散模型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交叉研究的议题,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沃克最早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社会科学规范意义上的研究(Walker, 1969)。沃克的文章提出了“政策创新如何扩散”的新问题,并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清晰定义,采用适当方法开展经验研究。自沃克开始这一领域逐步发展壮大。贝里等人(Berry F S and Berry W D, 1990)的文章开创性地使用事件史模型对政策扩散进行定量分析,并在理论框架上完善了由内部原因和外部因素组成的自变量体系,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方法基础和解释框架。而在近十年快速发展的关于中国体制下政策扩散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进一步引入上下级政府纵向权力关系和横向政府竞争关系等特色变量,开展创新性演绎。这些文献构成了研究中国政策扩散问题需要对话的、提出原初问题的文献,以及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演绎的核心文献。

(三) 创新化理论框架

理论(分析)框架是一项具体研究与原初问题的关联性 & 论文创新性的具体体现,是理论演绎和经验归纳的联结点。在对话核心文献的演绎过程中,可在几个方面提炼创新性演绎要素:差异性概念及其测量、新的变量关系、约束条件下的新机制(管兵,2023)。上述要素既具有向上衔接理论体系的抽象维度,又联结可测量的经验事实,既有理论抽象功能,又有经验分析功能。由此形成在知识积累中尤为重要的中层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理论框架位于最为中心的位置,是研究创新性的具象化。在具体写作与思考过程中,理论框架是在现有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不断反复、不断调适而生成的,难以一蹴而就。理论框架缺失会导致研究意义无从定位,论文逻辑无从把握。在现实研究工作中,理论框架的运用常常存在以下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因为缺乏演绎带来的。

理论框架不是理论应用。初学者容易直接把既有理论作为论文的分析框架,用其描述和解读现实经验。这一现象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都存在。例如,在公共管理学科,将“多源流理论”“间断均衡理论”“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等已有范式套用到经验事实上,把经验的不同内容对应到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关系维度等,对照这些要素,讨论不同维度上的经验表现和缺失,进而得出经验结论。梅赐琪(2025)细致分析了史密斯模型被广为应用却并未带来学术知识增长的事实,认为这是研究者服从知识权威的理性选择,在其他多个领域,比如“技术治理”领域,也存在

类似的情况。

理论框架不是事件流程图。绘制复杂的经验实践流程图或者关系图被定位成一种理论框架,但这里面存在着误区,因为这过于经验化,缺乏理论抽象性。在经验层面上,流程图有助于简化事实,有利于经验总结。由于缺乏演绎和向上的抽象,论文难以借此为研究的理论创新辩护。

理论框架不是思维导图或技术路线图。随着研究工具的发展,绘制直观美观的思维导图成为简便做法。思维导图或者技术路线图有助于理解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关系、方法运用,但与理论框架并不相同。理论框架更为简洁,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思维导图是整体性的,涵盖论文各个方面。技术路线图更侧重于从方法角度如何用经验材料回答理论问题。

创新化理论框架通常有三种类型:分类框架、解释框架、过程机制框架。

分类框架致力于界定新的类别。这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建立在单一维度上的分类框架是最基础性的,各个学科中特别重要的概念很多来源于此。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的来源将其分为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行政体制根据权力的集中程度可分为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等不同类型。费孝通根据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方式将社会分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科学学者在多个维度上界定了众多的二分概念类型,这些概念类型均属于此类。建立在两个维度上的分类框架也比较常见。比如在国家类型的划分上,研究者可根据国家直接占有经济的程度和提供福利的水平,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建立在三个维度上的分类框架比较复杂,应用也相对较少。赵鼎新根据组织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对不同政治行为进行分类,共分为七种类型(赵鼎新,2006)。

解释框架致力于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定量研究中这是由假设及其形成的理论关系构成的。这一点在定量研究中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定量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假设。在定性研究中,解释框架因容易被忽略而变得更加重要。定性研究的解释框架可以是一组解释关系,即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的关系,也可以是两个或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一旦超出三个自变量,传统的定性案例研究将会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更多的案例,但更多案例又会导致定性案例研究失去其在经验质感上的传统优势。案例研究难以处理较多的变量关系和过多的案例,因此其自变量往往是一个或两个,构成案例研究可以驾驭的解释关系。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特别有名的模糊冲突模型就是其中一例。该模型通过冲突性和模糊性两个变量,解释了四种类型的政策执行方式(Matland, 1995),具体如表3所示。相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丁悦在解释政府不同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时,也构建了一个二维矩阵(Ding, 2020)(见表4)。解释框架与分类框架的区别在于解释框架的维度是解释变量,矩阵中的类型是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性结果;而分类框架中的维度并非解释变量,这一框架更倾向于进行描述性研究。

表 3 模糊冲突矩阵:政策执行过程

		冲突性	
		低	高
模糊性	低	行政执行 资源 案例:天花根除计划	政治执行 权力 案例:强制性跨区就读政策
	高	实验执行 情境条件 案例:启蒙计划	象征执行 联盟强度 案例:社区行动机构

素材来源:Matland(1995)。

表 4 能力、监察与政府行为

		能力	
		低	高
监察	低	惰性的	家长式的
	高	表演性的	实质性的

素材来源:Ding(2020)。

过程机制框架致力于还原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因果机制链条,由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构成。过程追踪是定性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在定量研究中,可采用面板数据等具体方法纳入时间作用。在定性研究中开展过程机制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确定一组因果关系已属不易,厘清一整条因果关系链条则更为艰巨。因此,学界虽常见关于过程追踪的方法探讨,但严格按照这一方法开展的经验研究仍较为有限。刘军强等在解释地方政府为何持续推出农业新产业问题时,就采用了过程机制分析(刘军强等,2017)。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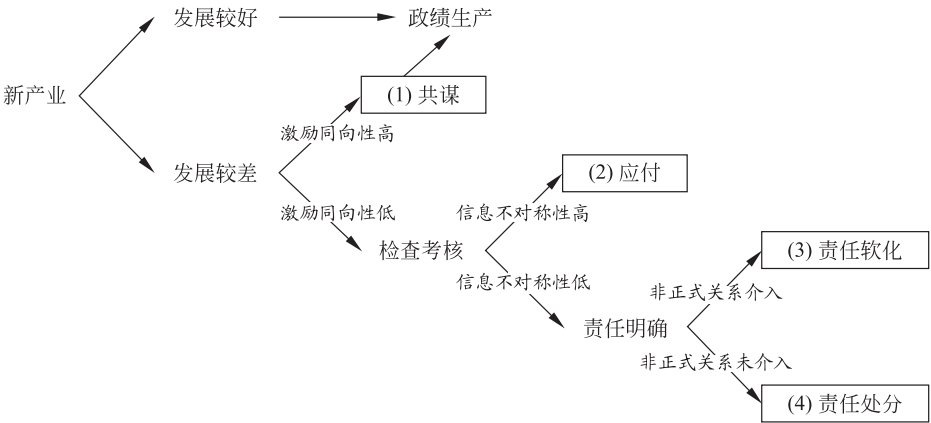


图 1 基层政府面对产业发展不同状况的策略选择

素材来源:刘军强等(2017)。

(四) 系统化研究设计

在具体的研究问题及理论分析框架之下,研究设计成为操作化的环节,变量、关系、资料类型等都因研究问题与理论框架而被限定。研究设计是依托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经验资料回答研究问题的过程。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研究设计是联结研究问题、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的桥梁。其主要步骤有:根据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选取适配的设计类型;定义研究变量,明确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以收集饱和的经验资料,确保与理论框架一致;随后依据研究设计开展数据收集,并结合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分析数据和资料。相较而言,定性研究更需要重视这一环节。在定性方法的选用依据、理论框架与定性经验操作化的内在关联、资料收集的缘由与路径等方面都需要在研究设计中更为具体、清晰且透明化地加以阐释(Ashworth et al., 2019)。在定性研究中,学者虽常在论文中介绍资料收集方法,但缺乏从演绎和理论框架视角论证所收集资料具有理论饱和度且足以提供充分有效的经验支撑。在定量研究设计中必须考量的控制变量、内生性问题及竞争性解释等,在定性研究设计中同样需予以充分关注。该领域已有丰富文献展开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五) 维度化描述和分析经验

经验研究中的“经验”是理论导向下的经验,是经过理论加工的经验,如烹饪过的原材料。经验呈现的核心特点是分析性。分析性是理论演绎结果在经验材料上的表现。分析性意味着理论相关性、论证逻辑性,还意味着对材料的高度选择性使用,这些材料包括验证性经验材料和与排除竞争性假设和替代性解释相关的材料等。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质感正源于此。经验不仅要充分、相关联,还应是维度化的、具备内在逻辑的。同样是对经验故事的介绍,是否具有维度化的分析性是学术研究与传统媒体和社交自媒体的根本差异。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我们需要自我约束。既要避免沉溺于经验世界的丰富内涵,防止在学术陈述中被整体主义取向的全部生活细节所裹挟,也要克制对宏大抽象理论的过度偏好,避免将外延广阔、难以测量的高度抽象概念未经操作化地用于经验分析。社会科学学者的基本素养正是对经验世界进行理论化叙事的能力。

原汁原味地呈现现实经验是一种奢望。客观呈现经验材料是学术伦理要求。在此基础之上,高效呈现经验材料需将其置于理论框架之中,以理论框架的具体维度客观描述、分析经验素材。基于此,经验材料在学术讨论中才能具有分析性,而非简单地向读者堆砌罗列。理论框架中的概念、变量和关系指引着经验材料的选取与分析。理论框架服务于研究问题。社会科学研究问题始终追问经验世界为何存在差异性(variation)(赵鼎新,2021)。呈现经验材料的核心逻辑便是展现观察到的与测量到的经验差异性。

内部差异性经验呈现的重点。概念和变量在经验测量上的不同类型或者观测值是经验呈现的核心内容,其他经验素材只是背景性材料。概念和变量是对经验的切割和取舍,决定了经验材料需在既定的抽象维度下进行介绍。衡量经验材料是否充分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呈现既定维度下的经验谱系和类型。描述性研究需将研究的特定类型与已有文献的经验类型进行内部多维度比较。解释性研究则需充分呈现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维度下的多重差异。在充分介绍研究经验的内部差异性之外,还需通过比较呈现外部差异性。与已有文献中的类型、关系、替代性解释进行比较,能更精准定位研究中具体经验在整体经验世界中的位置。通过差异性分析建立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差异性分析可表现为:以时间节点为参照对比不同时间段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差异及其对应关系;对多案例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不同测量值的差异及其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呈现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多条差异化路径并开展因果机制分析。这些均是经验材料呈现的具体指引和相关维度。

(六) 情境化约束条件

界定约束条件是关于结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这有助于给出一个有节制的结论,使之更有理论效力。在定性研究中,在约束条件下探讨有限案例下的因果关系,本质上等同于在一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这些关系方能有效。在理论框架的具体维度上,受控的比较是建立经验事实内在关联的可行方法。在定量研究中,控制变量的逻辑易于理解,充分的控制变量有助于计算特定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真实效应。在定性研究中,理论框架和维度化分析则有助于辨析案例定性解释的情境性问题和竞争性解释。在当前高度重视因果推论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无论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均需直面该问题,并切实地做好回应。

以演绎为导向的经验分析有助于全面考量控制变量和竞争性解释。定量研究早已关注这一点,技术方案也日趋成熟,追求更严谨的因果推论已成为定量方法的主流方向。定性研究在描述和分析经验材料时需考虑更多维度:不仅要充分呈现解释框架中变量的经验表现及其关系机制,还需像定量研究一样考虑控制变量和各种替代性解释。一项因果解释若能成立,需控制的因素极为繁杂,往往超出定性研究所能掌握的资料范围。在使用一手和二手经验材料论证其他解释不成立或其他解释不影响本文结论的过程中,理论演绎的意义更加凸显。定性研究更需通过理论演绎在抽象和逻辑层面排除更多竞争性解释,从而降低对经验素材的过度依赖。同时,在最大化利用经验材料的情况下,通过对控制变量的讨论明确经验的情境属性、可比性和结论适用范围。

当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在具体情境下成立的因果关系也会随之改变。通过这种方式,可从方法层面更有针对性地探讨定性研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意义。定性研究由于其经验的有限性,其结论往往更受制于情境性要素。若忽视这些情境性要素,经验研究给出的建议会带来政策失灵后果,原因在于经验移植忽视了制度环境

的构成性约束。在因果解释中明确约束条件,不仅能规避过度普遍化带来的理论危机,更可通过“受限的普遍性”(bounded universality)提升解释精度。社会科学解释的效力取决于其与具体社会情境的精确匹配度,这种解释适配性要求研究者严格界定理论的适用边界(Abbott, 2004)。理论的节制性绝非缺陷,反而构成了知识积累的可靠阶梯。

在具体操作上,定性研究需对经验所在的情境性要素展开更系统的分析。这些情境性要素是由一组控制变量的特定取值构成的。当控制变量变化时,研究所处的情境也随之改变,结论可能面临修正。正如上一部分所述,定性研究的局限性就是无法充分控制更多变量,而演绎有助于缓解这一困境。在依托演绎逻辑并借助已有文献排除大部分控制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具体研究可聚焦少数特殊情境性变量展开探讨。这些情境性变量构成了此项研究的特殊性。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下,研究结论才具有普遍性意义。

五、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人工研究质量：以理论为中心

对于社会科学学者而言,当前正处于一个关乎志业与职业的紧要关头。技术革命带来了研究范式革命和学科建设革新,社会科学面临的并非都是机遇。数据技术使得海量数据分析成为可能,机器学习在选举预测、犯罪热点识别等领域获得成功。数据归纳及由此展开的预测,成为计算科学的显著优势。这为社会科学产生新贡献提供了可能性,却也动摇了社会科学作为“解释科学”的根基。当预测准确率成为评价标准,数据科技将会进一步胜出。以原始数据为母体、以数据挖掘为主的大数据方法在回答“是何”(what)类问题方面独具优势,而在回应“如何”(how)和“为何”(why)类问题时仍力有不逮(Mayer-Schönberger and Cukier, 2014)。而数据科学和大语言模型在因果推理精度和理论创新上的不足恰恰是社会科学学者依托人工思考、开展深度分析的优势。

把解释做得更好,似乎是社会科学学者值得坚守的方向。在归纳上数据科学将会积累愈发明显的优势,但在理论演绎领域,人工仍有一席之地。在有限经验之上,尤其是在具有独特性的一手经验之上,有效演绎并实现理论创新,仍是社会科学学者的优势。理论演绎在当前时代显得更加重要。在中国情境下,理论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中国经验在全球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需要在具有启发性、突破性的理论建构中将这一问题具体化、操作化。同时在人人可用大语言模型的环境中,理论被普及,概念被标签化,理论概念和抽象知识以正确或被误解的方式更深地融入个体现实生活。大语言模型利用海量文本优势可近乎无成本产出拼凑式概念和组合式理论,但其缺乏真正的逻辑深度与创新价值,通过演绎实现的理论创新仍是人工强项。社会需要更好的理论,以精准回应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多重因素催生了真实强烈的理论需求。社会科学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被需要。

导向理论的经验研究的主语仍是经验研究,经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便缺乏理论对话的经验总结,也有可能具有意义,尤其是针对新经验的学术研究,描述和总结新经验本身就具有学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框架的作用是帮助学者界定经验材料的“新”,产出一种值得社会科学关注的新经验类型,甚至提炼出新的学术命名和概念(管兵,2016)。演绎仍有助于纯经验描述的研究。这是寻找差异性的一步,也是解释差异性的起点。需要明确的是,对演绎的强调并非否认经验的价值,正如引言所述,经验与理论、归纳与演绎始终是相互赋权的关系。本文重点关注演绎不足的问题。现实中,也存在过度演绎的情况。例如,针对一个村居、一个事件、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政府机构的经验,不同研究往往以不同视角切割经验、过度包装概念,将特殊机制强行拔高到抽象理论层面,这在过度内卷的经验研究领域尤为常见。此外,过度演绎还可能导致假设沦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无益于真实的理论发展(Hay, 2004)。同时,演绎并非万能的研究工具。在探索性研究或在新兴领域、缺乏理论基础时,演绎往往难以实施。此时,归纳方法更适合通过观察构建新理论。而在特定导向的定性研究领域,研究重点更注重情境理解,而非假设检验。更为关键的是,演绎高度依赖既定的理论前提,其有效性直接取决于理论前提的正确性。

在经验层面,大数据和大语言模型时代,社会科学学者更需拥有独特的一手资料。这本身在经验上就可建立起相对于大数据的比较优势。面对大数据和大语言模型的残酷竞争,当前学界对社会科学中使用的经验素材要求更高。这一点或许比对理论演绎的要求更高,实现难度也更大。“经验缺乏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博士生和学者苦于难以发现新社会事实,内卷、缺乏新意的经验素材本身已成为理论演绎的首要制约因素。幸运的是,数据变革带来了全局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新现象、新问题仍在持续涌现。而学者需要的正是足够的耐心和专心,在特定领域深耕细作,成长为“博物学家”,这有助于捕捉新的社会事实。在更加重视演绎的方法论之下,扎实的积累可有助于建立经验质感。

在这样的压力和机遇之下,社会科学需重回传统和初心,回归扎实的经验收集工作和真实的理论创新。回溯历史,在工业革命兴起和全球现代化转型之初,现代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传统哲学和神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关照现实、重视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化了知识理解。如今,面对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方法革命,社会科学学者唯有提供独特的、相对于人工智能仍能保持优势的知识贡献,才能守护好职业尊严和学术志业。

参考文献

- 奥利弗·E.威廉姆森. 2023. 交易成本经济学: 一个自然演进[M]//本特·霍姆斯特罗姆, 奥利弗·E.威廉姆森, 奥利弗·哈特, 等. 契约与经济组织. 陈耿宣, 陈恒亘, 颜超凡, 等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54-82.
- Williamson O E. 2023.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natural development [M]//

- Holmström B, Williamson O E, Hart O, et al. *Contrac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en G X, Chen H G, Yan C F, et al. trans. Shanghai: Gezhi/Sanlian/Shanghai Renmin; 54-82. (trans. into Chinese)
- 边燕杰. 2015. 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 12-23.
- Bian Y J. 2015. Empiric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J]. *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 (2): 12-23. (in Chinese)
- 费孝通. 1948.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观察社.
- Fei X T. 1948. *Rural China*[M]. Shanghai: Shanghai Observer. (in Chinese)
- 管兵. 2016. 命名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创新: 从《乡土中国》谈起[J]. *社会学评论*, 4(4): 18-33.
- Guan B. 2016. Methodology of naming and originality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 reflection on Fei Xiaotong's peasant life in China [J].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4(4): 18-33. (in Chinese)
- 管兵. 2023. 案例研究的理论化: 三种可行途径[J]. *广东社会科学*, (3): 198-210.
- Guan B. 2023. Theorizing case studies: Three possible approaches[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3): 198-210. (in Chinese)
- 孔飞力. 2012. *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陈兼, 刘昶,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Kuhn P A. 2012.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M]. Chen J, Liu C, tran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trans. into Chinese)
- 李连江. 2016. *不发表 就出局*[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Li L J. 2016. *Publish or perish*[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in Chinese)
- 刘军强, 鲁宇, 李振. 2017. 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用机制分析[J]. *社会学研究*, 32(5): 140-165.
- Liu J Q, Lu Y, Li Z. 2017. Active inertia: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J]. *Sociological Studies*, 32(5): 140-165. (in Chinese)
- 马克斯·韦伯. 1999. *社会科学方法论*[M]. 韩水法, 莫茜,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Weber M. 199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 Han S F, Mo Q,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trans. into Chinese)
- 梅赐琪. 2025. 从各事其主到各安其分: 公共管理研究和日常实践“两张皮”问题及解决之道[J]. *公共管理学报*, 22(1): 7-16, 168-169.
- Mei C Q. 2025. From authority-following to duty-following: Separation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daily practice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its solution[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2(1): 7-16, 168-169. (in Chinese)

- 蒙克, 李朔严. 2019.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案例方法: 一个误区和两种传承[J]. 中国行政管理, (9): 89-94.
- Meng K, Li S Y. 2019. Case study in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One misunderstanding and two tales of culture[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9): 89-94. (in Chinese)
- 彭玉生. 2011.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6(3): 1-32, 243.
- Peng Y S. 2011. Causal analyses in social science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6(3): 1-32, 243. (in Chinese)
- 王诗宗. 2010. 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J]. 中国社会科学, (4): 87-100.
- Wang S Z. 2010. Governance theory and paradigmatic progres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87-100. (in Chinese)
- 谢宇. 2024. 社会学本土化与定量研究的再思考[J]. 学术月刊, 56(3): 120-128.
- Xie Y. 2024. Rethinking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J]. *Academic Monthly*, 56(3): 120-128. (in Chinese)
- 张杨. 2007. 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J]. 社会学研究, 22(3): 136-153.
- Zhang Y. 2007. Is falsification possible in social science?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2(3): 136-153. (in Chinese)
- 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Zhao D X. 2006.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赵鼎新. 2021. 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J]. 社会学研究, 36(5): 113-134.
- Zhao D X. 2021. Strategies for raising research questions in analytical qualitative sociology[J]. *Sociological Studies*, 36(5): 113-134.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7): 36-50.
- Zhou L A. 2007.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7): 36-50. (in Chinese)
- Abbott A. 2004. 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Ashworth R E, McDermott A M, Currie G. 2019. Theorizing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luralit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rigor and richnes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9(2): 318-333.
- Auriacombe C J, Holtzhausen N. 2014.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realm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emerging researchers[J]. *Administratio Publica*, 22(4): 8-25.
- Berry F S, Berry W D. 1990.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2): 395-415.

- Bevir M. 2011.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storytell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89(1): 183-195.
-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4(16): 386-405.
- Ding I. 2020. Performative governance[J]. *World Politics*, 72(4): 525-556.
- Eisenhardt K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532-550.
- Hay C. 2004. Theory, stylized heuristic or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statu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82(1): 39-62.
- King G, Keohane R O, Verba S.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M]// Lakatos I, Musgrave A.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1-196.
- Matland R E. 1995. 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5(2): 145-174.
- Mayer-Schönberger V, Cukier K. 2014.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M]. London: John Murray Inc. .
- Merton R. 1968.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M]//Merton R.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39-72.
- Walker J L.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 880-899.

Without Deduction, the Story Always Seems Awkward

GUAN Bing^{1,2}

(1. School of Government, Center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Research,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Center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Research,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pedagogy exhibits a pronounced theory-empirical dichotomy. Curricula tend to privilege training in data collection and inductive techniques,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theory-building capabilities—represented by deductive methods—is either marginalized or conflat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and courses on disciplinary history. This fragmentation renders researchers ill-equipped to conduct “theory-driven empirical research.” In an era wher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ve disrupted the traditional primacy of induction, deductive competence has emerged as an irreplaceable intellectual asset for researchers. In research

practice, the deficit in deduction manifests as: adop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ithout engaging in deductive reasoning; conducting literature reviews that are disconnected from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design; presenting empirical data with insufficient analytical depth; and offering empirical summaries that lack extrapolative generalization. To address these, we propose a pathway of “deductive operationalization”: sustained interrogation of foundational paradigmatic questions, engagement with deductive trajectories in seminal literature, forward-looking deduction to innovat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empirical evidence, and explicit articulation of boundary conditions. Born of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cial science must now reclaim its foundational ethos in the face of the AI revolution—cultivating both empirical rigor and theoretical robustness. Only by providing unique epistemic contributions that retain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ver AI can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defend both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ir vocation.

Keywords: induction; deduc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method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投稿日期: 2025/3/19 送外审日期: 2025/3/27 首轮外审完成日期: 2025/4/25
录用日期: 2025/8/17 最终修回日期: 2026/3/4